

纳百川。

《新民周刊》：你也去过很多国家，上海城市的窗户，和西方国家的窗户有什么不同？

杜海军：来到上海十多年，我最喜欢画的还是这座城市的一扇扇窗，和窗户里平凡的、有烟火味道的城市生活。

上海这座城市和西方城市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上海很多人在窗上晾晒衣服，这在西方城市是看不到的。他们不能随便晾晒在外面的，一般都是烘干。可见不同国家的窗口是不一样的，从窗口可以反映城市之间的差异。而上海的城市窗口最精彩。2006年我到上海之后，把上海的老街都走了一遍，拍了很多照片。当时拍照不是为了马上创作，而是做一些记录工作。实际上，每扇窗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家庭。我想通过窗这种形式来带出这座城市背后的故事。

艺术家要记录这个城市的精神状况我觉得比较重要。比如我画的是外滩，但我并不想画外滩的历史，因为我不了解它，没有感触。我感兴趣的是从窗这个切面看城市的精神面貌。

《新民周刊》：我看到这次展览中也展出了一些你的装置作品，什么时候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和你家乡是宜兴有没有关系？

杜海军：是的，我是宜兴人，以前回老家，住一晚上就走了。后来有一次我和宜兴的一些朋友聊天，就想是不是可以用紫砂材料来做一些艺术品。正好这个展览的空间，也需要一些装置来做一些点缀。我还用朽木做了一个都市森林的装置，因为都市中没有森林。



上图：杜海军绘画作品《城市地铁》。

《新民周刊》：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有几幅记录上海疫情的画作，上海疫情期间你在上海吗？

杜海军：在上海。我当时被封控在松江家里，出不去，也无事可做，除了吃饭睡觉，只有画画。这样我的工作时间比以前多了一倍。也很庆幸我那时候准备了很多绘画材料，不然没有材料我也画不了。

这段时间我效率特别高，画了三张大画，来表现这段时间的上海。这个时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如果在你的绘画中看不到一丁点痕迹，我觉得也是不对的。

与上海的“百年对话”

《新民周刊》：《和谐号》这幅画画的是来自你自己坐高铁的经历吗？

杜海军：我每次去北京都坐高铁，方便准时。我拍了大量的照片作为素材记录，发现最精彩的是下高铁的那一刹那，门打开时，各色人群拥挤而出的场景，这也是我在画面中着重表现的地方。其实，这

种画法也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如果按照西方人的焦点透视，高铁是没法画的，也许只能画到车门和车窗，但我用中国的平面散点透视，把重点抽离出来，把人群画进去。我拍过大量资料，除了美学调整外，也会注重选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人物描绘，比如拉着行李箱低头玩手机的人，带孩子玩iPad的父母，还有拿着电脑办公、跨两地工作的白领。我用写意的方法表现我在“复兴号”上看到的人群，他们是这个时代鲜活可爱的中国人。

“**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写意，我希望在这些作品中都能得到呈现。**”

《新民周刊》：从《百年对话》《向左向右》到《时代镜像》，你一直都在形式上进行探索，这种探索贯穿了你的绘画历程。易英先生说你的“画充满形式感，但他的形式不是现代主义的形式之美，而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表达”，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杜海军：是的。比如《百年对话》这张画，我画了老的建筑和新的建筑的对话，一方面是百年前的建筑，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建筑，这张画其实是浦东浦西并在一起，左边浦东，右边浦西。